

吳語“吃仔飯”的斷代問題

梅祖麟

Cornell University

本文討論為什麼用語法，音韻兩種標準給吳語“吃仔飯”斷代，會得到兩種不同的結果，其間相差五百年有餘。第一節說明“吃仔飯”這種[動詞+完成貌詞尾+賓語]的結構，至早產生於十世紀以後。第二節說明，屬於魚虞有別那個層次的“著(仔)tsi²”字，是承繼南朝的江東方言。第三節解釋為什麼兩種斷代標準所得的結果不同。第四節是餘論和結論。

1. 語法標準

北京話說“吃了飯了”，蘇州話，上海話說“吃仔飯哉”

¹ “仔tsi²”的本字是“著”(梅祖麟1979, 1988, 1993)。

“吃仔飯”的結構是[動詞+完成貌詞尾+賓語]。按照語法史的標準斷代，這種結構形成於十世紀以後。理由如下：

第一，[動+“著”(賓)]這種表示完成貌的結構最早出現於十二，十三世紀的白話文獻(梅祖麟1988: 199)。

若依彥冲差排，則孔夫子釋迦老子，殺著買草鞋始得。

(宗杲(1089-1163)<<大慧書>>(日本，築摩書房，1969),
89頁)

才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為耻。

(同上，128-129頁)

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詩不足觀矣。(朱熹(1130-1200)<<朱子語類>>(臺灣影印成化本)，3348頁)

只見老大，忽然死著，思量來這是甚則劇，恁地悠悠過去了。(<<朱子語類輯略>>，210頁；比較趙元任(1928：119)蘇州話的例子“我死仔僚那亨”(我死了你怎麼辦))。

同着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寫着表文一道。(<<宣和遺事>>元集)

宋江寫着書，送這四人去梁山尋着屍蓋去了。(同上，元集)

若不實說，便殺着你。(<<三國志平話>>卷中，404)

第二，現在的“吃了飯就去”，晚唐說“吃飯了便去”，例如：“其僧吃飯了便去”(祖，4：37)。 <<祖堂集>>里“V了O”的用例一個也沒有；唐詩，五代詞，變文里總共只有五個“V了O”的例(曹廣順1986：196，202注11，12)。據此，“V了O”這種表示完成貌的結果至早產生於十一世紀。

此外我們知道“V了O”興起的過程，是先在唐代產生[動+結果補語+賓]這種結構，例如：

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開天傳信記，太平廣記92卷引)

然後在晚唐產生“V卻O”這種[動+時相補語(phase complement)+賓]的結構(曹廣順1986；梅祖麟1991)，例如：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卻此田舍漢！”(大唐新語)

忽然口發人言，說卻多般事意。(敦煌變文集，495)

如似種子𪗇田中，種卻一石收五斛。(同上，469)

“V卻○”中的“卻”字虛化，從時相補語變成完成貌詞尾，於是促成表示完成貌的“V了○”的產生。

我們認為，表示完成貌的“V著○”在早期吳語產生，是受了早期官話“V了○”的影響。據上所述，“V了○”的促成條件--[動+結果補語+賓]，[動+時相補語+賓]--分別產生在唐代和晚唐。

“V了○”本身產生在十一世紀。表示完成貌的“V著○”最早出現在十二世紀的文獻，跟文獻上的“V了○”密切銜接。

因此，用語法史的標準給吳語“吃仔飯”斷代，年代要訂在十世紀以後。

2. 音韻標準

一旦追究為什麼“著”在蘇州話會變成[tsi²]音，就會發現這是南朝江東方言魚虞有別那個層次的遺迹。換句話說，用音韻標準給“著(仔)”這個虛詞斷代，結論是這個虛詞產生於五，六世紀。

蘇州話以及其他吳語的音系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一個魚虞有別，一個魚虞相混。

	主 <small>虞</small>	處 <small>魚</small>	住 <small>虞</small>	書 <small>魚</small>	樹 <small>虞</small>	豬 <small>魚</small>	煮 <small>魚</small>	鼠 <small>魚</small>	芋 <small>魚</small>	箸 <small>魚</small>
蘇州	tsu	tshu	zu	su	zu		tsi	si	zi	
上海	tsi	tshi	zi	si	zi	tsi	tsi	tshi	zi	
溫州	tsi	tshi	dzi	si	zi	tsei	tsei	tshei	dzei	dzei
金華	tcy	tchy	dzy	cy	zy		tsi			
溫嶺	tcy	tchy	dzy	cy	zy	tsi	tsi		dzi	dzi

以上是魚虞韻知章系聲母的字。蘇州話魚虞有別層次的字在魚虞相混的層次另有一讀，如“煮tsu”，“鼠tshu”。“著”

字兩讀，文讀tsu²，白讀就是tsi(仔)。跟[ɪ]韻的“煮，鼠，芋”比較，可知“著(仔)tsi²”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

吳語中魚虞有別的現象，不但在知章系聲母的字可以看到，在其他聲母的魚虞韻字也可以看到。

	具 _虞	舉 _魚	句 _虞	渠(~道) _魚	鋸 _魚	去 _魚	渠(他) _魚	魚 _魚	虛 _魚	許 _魚
蘇州	dzy	tɕy	tɕy	dzy	kE	tɕhi		ŋ	hE- _腫	hE _{那兒}
常熟	dzy	tɕy	tɕy	dzy	kɛ	khɛ	gɛ	ŋ	ɛ	hɛ- _腫
上海	dzy	tɕy	tɕy	dzy	kE	tɕhi	ɿhi	ŋ	hE- _腫	hE _{那兒}
溫州	dzy	tɕy	tɕy	dzy		khei	gi	ŋ		hi _那
金華	dzy	tɕy	tɕy			khə	gə			xə _{允許}
溫嶺	gy	ky	ky	gy		kie	khie	gie	ŋ	he

見曉系聲母魚虞韻的字

	趨 _虞	需 _虞	鬚 _虞	娶 _虞	聚 _虞	序 _魚	絮 _魚	蛆 _魚	徐 _魚
蘇州	tshy	si	səu	tshi	zi	zi	si	tshi	zi
	tshi		si						
上海	tshy	sy	su	tshy	zy	zy	si	tshi	zi
			sy						
溫州	tshɿ	sɿ	sɿ	tshɿ	zɿ	zɿ	sei	tshɿ	zei
								tshei	
金華		ɕy	su	tɕhy	zy	zy	ɕy		zy
			ɕy				si		zi
溫嶺			ɕy		zy		sɿ		

精系聲母魚虞韻的字

	助 _魚	初 _魚	楚 _魚	數 _虞	梳 _魚	鋤 _魚
蘇州	zəu	tshəu	tshəu	səu	sɿ	zɿ
上海	zu	tshu	tshu	su	sɿ	zɿ
溫州	zəu	tshəu	tshəu	səu _文	sɿ	zɿ
				sɿ _白		
金華	dzu _文	tshu	tshu	su	(su)	zɿ
	zu _白					

溫嶺

tshu

si zi

莊系聲母魚虞韻的字

至于吳語里魚虞有別那個層次的來源，我們認為是南朝江東方言的遺迹。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北人以庶御韻為戍遇韻，以如魚韻為儒虞韻”；又說“北人之音，多以舉韻莒韻為矩虞韻”。這幾句話是說北人魚虞相混，南人魚虞有別。

<<切韻序>>說：“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南北朝時代，江東所指的主要是三吳(丹陽，吳郡，吳興)和會稽，南朝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地區，也就是太湖周圍的江蘇南部以及浙江。河北所指的是以洛陽，鄴下為中心的北方。本文沿用<<切韻序>>的“江東”，“河北”。“江東方言”是指以金陵音為標準，在南朝江東地區流行的方言。

上引<<顏氏家訓>>那幾句話說明江東方言魚虞有別。此外顧野王原本<<玉篇>>(543年)，陸德明<<經典釋文>>(583年)的反切，以及南朝文士詩文里的押韻，也是魚虞有別。顧野王，陸德明都是吳郡吳人(今江蘇蘇州)。他們所說的江東方言魚虞有別，現代的蘇州話以及其他吳語方言有個層次魚虞有別。據此，吳語魚虞有別那個層次是承繼南朝的江東方言。

有人也許會如此質難：日本漢音反映的是八世紀北方標準音系，漢音魚虞有別。另有其他資料可以說明，武則天時代的長安音以及唐五代的西北方音也是魚虞有別(潘悟雲1983: 83)。怎麼知道現代吳語魚虞有別那個層次，不是來自唐代的標準北方話，而一定是來自南朝的江東方言？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回答這個質難。

第一，根據<<顏氏家訓·音辭篇>>中其他論南北之別所說的話，可知當時的江東方言在聲母方面從與邪，船與禪不分，在韻母方面魚虞有別，支與之脂有別，洽與狎有別。此外根據原本<<玉篇>>里的反切以及劉勰<<文心雕龍>>五十篇贊的押韻，可知覃談有別也是江東方言音韻特徵之一。這些特徵或多或少地都保存在現代吳語中較早的層次(梅祖麟1993)，可見魚虞之別不是這個較早層次里孤立的現象，而是整套江東方言各種音韻特徵之一。

第二，吳語魚虞有別的層次含有“渠_他”，“許_{那，那兒}”兩個指代詞。這兩個指代詞是江東方言的方言詞。

“渠”是第三身代詞，初見於<<三國志·吳志>>，次見於庾信詩(呂叔湘1985: 6)。

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三國志·吳志·趙達傳)

無奈人心復有憶，今暝將渠共不眠。(庾信，庾子山集 6.4)

兩個例句的出處，都是江東文獻。唐代劉知幾<<史通>>卷十七“北齊書”條：“渠伊底_箇，江左彼此之辭。”遠在唐代，劉知幾已經知道“渠”是江南的方言詞。

第三身代詞“渠”的現代分布在長江以南。除了吳語以外，還有贛語(南昌_{ㄟtchiɛ})，客家(梅縣_{ㄟki})，粵話(廣州_{ㄟkhɔy})，北部閩語(建甌_{ky₂})。

參看吳語“見曉系聲母魚虞韻的字”所列舉的例字，可知吳語“渠”字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蘇州話現在第三身代詞不用“渠”，但馮夢龍(1574-1645)時代的蘇州話用這個字。鄰縣常熟的“渠_{ㄟgɛ}”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如果這個字屬於常熟話魚虞相混的層次，就會說成_{ㄟdʒi}，如“渠道”的“渠_{ㄟdʒi}”。

同樣的，表示“那，那兒”的“許”字，最早出現於南朝文獻，現在的分布限於長江以南。吳語表示“那，那兒”的“許”字也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下面說明這三點。

遠指詞“許”字，南朝民歌里的用例頗多：

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宋武帝<<丁督護歌>>，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文學古籍刊行社)卷45頁5左)

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團扇郎>>，同上，45.6 左)

今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南齊書，王敬則傳)

“許”字另外一個用法是表示“那里，那兒”：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
(世說文學)

荀有寶劍，可直百萬金，常在母鐘太夫人許。(又，巧藝)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又，任誕)

指代詞“許”字的現代分布限於長江以南。除了吳語以外，還有北部贛語(南昌^{ɸhe}“許那”)，閩語(福州^{ɸxi zieʔ}“許只那個”；廈門^{hit₅ ɸe}“許一其那個”(hit₅是“許一”的合音詞))。

參看吳語“見曉系聲母魚虞韻的字”所舉的例字，可知“許那，那兒”還保存在吳語魚虞有別的層次，例如溫州“^{ɸhi kaiʔ}“許個那個”。蘇州，上海都有“辣海”[laʔ₅ ɸhE]一詞，意思是“在，在那兒”，例如：

王先生阿辣海? 勿辣海。(王先生在不在? 不在。)

上海又有“海頭”一詞，加在名詞後面，意思是“那里，那兒”(許寶華，湯珍珠等1988: 414, 421):

小因辣娘舅海頭吃飯。(孩子在舅舅那里吃飯)

儂兒子辣橋海頭立辣海。(你的兒子在橋那邊站着)

“辣海”，“海頭”的“海^{ɸhE}”本字是“許”，用法和<<世說新語>>里的“許”字一樣。“海頭”就是“許(^{ɸhE})頭”。

現在可以回到以前問的問題：怎麼知道現代吳語魚虞有別那個層次，不是來自唐代的標準北方話，而一定是來自南朝的江東方言？

無論從文獻出處來看，還是從現代分布來看，“渠”，“許”這兩個指代詞，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一直是江南方言的方言詞。唐代北方話第三身代詞用“他”，遠指詞用“那”，根本沒有“渠他”，“許那”這兩個指代詞。所以即使假設現代吳語魚虞有別的層次來自唐代的標準北方話，仍然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渠”，“許”這兩個指代詞，跟“鋸，去，虛”等一樣，都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相反的，假設現代吳語魚虞有別的層次來自江東方言，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說明為什麼這兩個江東方言的方言詞現在還保存着江東方言的音韻特徵。

3. 新瓶子裝舊酒

第一節說明，按照語法標準，吳語“吃tsi²飯”這種[動詞+完成貌詞尾+賓語]的結構，至早產生於十世紀以後。第二節說明，

按照音韻標準，吳語完成貌詞尾“著tsi²”字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而這個層次形成於南朝五，六世紀。這兩種斷代標準所得的結果相差五百年有餘。這一節嘗試解釋，怎麼樣南朝形成的“著(tsi²)”字和兩宋形成的[動+完成貌詞尾+賓]會湊在一起，在吳語里產生“吃tsi²飯”。

“著”字在江東方言虛化後最初用作方位介詞，例如：

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世說·德行)

從這時開始，“著，箸，豬”這類魚韻的字就與“駐，註，住”這類虞韻的字音韻演變不同。十世紀以後，方位介詞“著”字在吳越地帶蛻變為完成貌詞尾。這種情況延續下去，至晚在明末馮夢龍時代產生“吃仔飯”這種南朝音韻，兩宋句法的句子。

當然，方位介詞“著”變成完成貌詞尾“著”不是一蹴而成，當中還有個過渡階段，其間“著”字又用作方位介詞，又用作完成貌詞尾。為了說明這種演變過程，需要介紹幾個術語。

A：“著”字用作方位介詞。典型例句：“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世說·德行)

B：“著”字用作完成貌詞尾。典型例句：“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詩多不足觀矣。”(朱子語類)

{ $\frac{A}{B}$ }：“著”字又用作方位介詞，又用作完成貌詞尾。

魚(開)韻字：在本方言的演變跟同類聲母的虛韻字不同。跟虛韻字相混的魚韻字本文叫“魚(合)韻字”。

下面打算論證的演變過程是：

年代	南朝		兩宋
	A	>	{ $\frac{A}{B}$ }
			>
			B
	↓		↓
代表方言	閩南		青田
典型文獻	世說		蘇州,上海
“著”字音韻特徵	魚(開)韻		魚(開)韻
			朱子語類
			魚(開)韻

就吳越地區來看，它在南朝屬於A型。到了朱熹(1130-1200)時代，吳越地區有一部份變成B型。至于{ $\frac{A}{B}$ }式的兼用型，我們只知道它產生在A與B之間，而且{ $\frac{A}{B}$ }型在吳語各次方言區的流行時期也有久暫不同。上面表中年代一項所列的“南朝”，“兩宋”是根據文獻訂的，吳越閩地帶各個方言中[A>B]這種演變的年代自當分別論之。

(1)閩南話

廈門話“坐^{ti}椅頂”(坐在椅子上)的[ti²]字，本字是“著”。

這種“著”字的用法跟<<世說>>“坐著膝前”的“著”一樣(梅祖麟1988: 196)。而且閩南話中的廈門話，臺灣話根本沒有[動詞+完成貌詞尾+賓語]這種結構(梅祖麟1991; 袁家驊1960: 276-277)。可見閩南話是A型。

閩南，閩東一般是魚虞有別，下面舉知系聲母的例字。

	豬 ^魚	箸 ^魚	柱 ^虞	住 ^虞	著 ^魚 (方位介詞)	廚
福州	ty ¹	ty ⁶	theu ⁶	tiu ⁶	tyɔ ²⁸	ɿtiu
隆都	ti ¹	ti ⁶	[tshi ³]	tiau ⁶		
廈門	ti ¹	ti ⁶	thiau ⁶	[tua ⁶]	ti ⁶	ɿtu
潮州	tu ¹	tu ⁶	thieu ⁴	tiu ⁶		ɿtu, ɿtou
定安	du ¹	du ⁶	hiau ⁴	—		

廈門話“著”字的演變和“箸”，“豬”一樣，都是屬於江東方言魚虞有別的層次。

(2) 青田話

下面轉引拙著(1988: 204-205)里浙江青田話的例：

吃了進去 走了過去 跌倒了 掉(蹬)了下來(落)
 青田話 吃[tsi]底 走[tsi]去 跌[tsi]倒 daŋ tsi lo⁷

坐在那里(搭) 丟在桌子上 丟到桌子上
 青田話 坐[tsi ta] 搵[tsi]桌上 搵[tsi]桌上

此外青田話“**𦉳**[tsi]床上”有兩個意思。一個表示這個人睡在床上，不是睡在地上，[tsi]表示方位；另一個表示這個人原來站在床邊或者坐在椅子上，現在睡到床上去了，[tsi]表示動作的方向和完成。這些例說明青田話的“著[tsi]”字用作方位介詞，也用作完成貌詞尾。青田話是{^A_B}型。

青田話有個層次魚虞有別，資料用的是傅國通等(1985: 34, 36):

	豬 _魚	著 _魚	蛛 _虞	朱 _虞	輸 _虞	主 _虞	樹 _虞	書 _魚
青田	ti	tsi	ty	tsu	su	tsu	zu	su

在魚虞有別的層次，魚(開)韻字是不圓唇的元音。

(3)蘇州話，上海話

上面討論得最多的是上海話，蘇州話，現在有兩點需要補充。

第一，上海話，蘇州話的方位介詞是[laʔ₂]，例如北京話的“坐在這兒”，蘇州話說“坐laʔ₂哀搭”，上海話說“坐laʔ₂豨搭”(許寶華，湯珍珠等1988: 420)。[laʔ]字語源不明，反正跟完成貌詞尾[tsiʔ]不是一個語詞。上海話，蘇州話是B型。第二，參看第一節魚虞韻例字的四個表，可見上海話有個區分魚虞的層次。但是知章系聲母魚虞韻的字，現在的上海話都說[i]韻。Edkins 1868年所記的上海音，知章系聲母的字，還能分辨魚虞兩韻：

	主 _虞	書 _魚	樹 _虞	豬 _魚	鼠 _魚	仔 _{魚(吃-飯)}
現在的上海話	tsi	si	zi	tsi	si	tsi
1868年的上海話	tsu	su	zu	tsi	si	tsi

這就說明上海話的“仔”字，跟蘇州話的“仔”字一樣，也是來自魚虞有別的層次。

再來討論文獻上所見的方言的語法類型。

<<世說新語>>中[動詞+“著”+處所詞]句型的例句凡十三見(詹秀慧1973: 428-431)，而且這種句型在其他同時期的白話文獻中也常見，例如太田辰夫(1987: 211)所引的：

城南美人啼著曙。(陳·江總<<樓鳥曲>>)

負米一斛，送著寺中。(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4)

畏王法令，藏著瓶中。(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1)

法力素有膂力，便縛著堂上。(梁·任昉<<述異記>>，
<<太平廣記>>327引)

由此可知方位介詞“著”是南朝江東口語中常用的虛詞。南北朝時期根本沒有態貌詞尾，所以江東方言是A型。

大慧(1089-1163)名宗杲，安徽宣城人。朱熹(1130-1200)，安徽婺源人(今江西)。這兩位都生長在江南。宣和四年(1122)大慧三十四歲初次北上到汴京，朱熹一輩子沒有涉足江北。南宋通用的語言是早期官話，南宋的白話文獻也是以早期官話為方言基礎。完成貌詞尾用“了”就是明顯的例：

狄仁杰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朱子語類輯略，19)

某告以臟腑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同上，19)

師云：阿難好箇應當如此，爭奈中間欠了一著。(大慧語錄，大正藏，第四十七卷，823下)

另一方面，大慧，朱熹是安徽人，說一種近似吳語的徽語，以致<<朱子語類>>，<<大慧書>>里間或也能看到用作完成貌詞尾的“著”字，如第一節引過的“孔夫子釋迦老子，殺著買草鞋始得”(大慧書)，“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詩不足觀矣”(朱子語類)。這兩句如果用早期官話說，就要說成“殺了買草鞋……”，“看了三百篇詩……”。

至于方位介詞，<<朱子語類>>，<<大慧書>>一般用官話方言的“在”，例如：

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朱子語類輯略，189)

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即將經文移來下面(大慧書，182)

據目前所知，這兩本書沒有方位介詞“著”的用例。

在這種情形下，很難說<<朱子語類>>，<<大慧書>>所反映的語言是B型還是 $\{\hat{A}_B\}$ 型。原因在於“所反映的語言”這個觀念值得商榷。

第一，<<朱子語類>>，<<大慧書>>都是以早期官話為主，方言為次的白話文獻。我們關注的是書中所透露的方言的消息。第二，上面看到青田話是 $\{\hat{A}_B\}$ 型，下面會看到安徽休寧話也是 $\{\hat{A}_B\}$ 型，“著tɕio˧”字用作方位介詞，也用作完成貌詞尾。宣城，休寧，婺源都在長江以內安徽的東南角，尤其是休寧離婺源很近。<<朱子語類>>固然沒有方位介詞“著”字的用例；但我們可以說朱熹的徽語根本沒有方位介詞“著”字，也可以說有，只是<<朱子語類>>沒有反映出來。受了資料的限制，這個問題目前無法解決。上面暫且把<<朱子語類>>列入B型，這種歸類是需要打折扣的。

這一節用方言和文獻的資料說明，方位介詞“著”字變成完成貌詞尾“著”經過A， $\{\hat{A}_B\}$ ，B三個階段。上海話，蘇州話正好屬於B型，就出現“吃仔(tsi˧)飯”這種句子。換句話說，“吃仔(tsi˧)飯”是新瓶子裝舊酒。瓶子是一個時代，酒是另一個時代。

4. 餘論和結論

還有一些相關問題需要討論。

第一，丁邦新先生(1988：18；1992：26)說過，“南北朝時代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那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來源”。丁先生是從音韻，詞匯(“儂人，骨文脚”)兩方面來看江東方言和現代閩語的關係。

從語法的角度來看，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南朝的江東方言，“著”字用作方位介詞；當時沒有完成貌詞尾。按照我們的說法，江東方言是A型。現在廈門和臺灣的閩南話，“著”字用作方位介詞，而且沒有完成貌詞尾，所以也是A型。很明顯的，就這個語法特徵來看，南朝的江東方言是現在閩南話的前身。

另一方面，現代吳音的音系固然可能是來自唐朝或更晚的北方，但是現代吳語還保存着江東方言的音韻層次。也許可以這麼說：江東方言在現代閩語是主流層次，在吳語是字數較少，遺迹性的底層。

南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在金陵，三吳。江東方言發源於此，然後向江南各地散播。到了今天，離發源地最遠的地方(閩南，閩東)語法最像南朝的發源地。中間地帶(青田)是混成 $\{A_B\}$ 型。而曾經作為發源地的蘇州(南朝的吳郡)反而語法最不像江東方言。原因是[動+完成貌詞尾+賓語]這種結構來自兩宋的北方。因為蘇南離北方近，所以借入了這種結構。浙南的青田離北方較遠，所以不但借入了這種結構，同時還保存着“著”字方位介詞的用法。閩地離北方遠，而且山川隔阻，所以一直到今天，[動+完成貌詞尾+賓]這種結構還沒有傳入。

第二，以前討論方位介詞“著”字的現代分布，一直以為閩語保存得最完整；蘭州話似乎有“放着桌上子”的說法(梅祖麟1988: 202)，但未經核對，不知是否確實如此。最近讀平田昌司先生(1993)的文章，才知道徽語休寧方言，“着tcio°”字用作方位介詞，也用作完成貌詞尾，持續貌詞尾。

方位介詞：“攔(tcio°)着桌上。”

完成貌：“完成體基本上由‘着’來表示”。平田文沒有舉例，參照安徽安慶話“吃着(tʂo₃)飯了”(吃了飯了)的說法(梅祖麟1988: 193)，休寧話大概是說“吃着(tcio°)飯”(吃了飯)。

持續貌：詞尾“te°”；(後起形式)詞尾“着tcio°”。

“坐te°吃比倚_站te°吃好點兒”。

“坐着(tcio°)吃比倚着(tcio°)吃好點兒”。

平田先生說明，休寧話用持續貌詞尾“着tcio°”是近年來受官話的影響。

休寧話“著”字用作方位介詞，也用作完成貌詞尾，所以是{ \hat{B} }型。但是“著 tcio°”看來是中古藥韻的字；平田昌司(1982:

282)列舉的休寧話藥韻字的讀音如下：

tcio腳；tchio卻，着；nio弱；cio勺；io約藥

蘇州話，上海話作為方位介詞，完成貌詞尾的“著”字是舒聲的魚韻字。現代吳語中有舒聲字促化的現象，如蘇州話的“鑊子(tsi)”，常熟話說“鑊則(tseʔ)”，完成貌詞尾“仔(tsiʔ)”，常熟，無錫，常州等地說“則tseʔ”。目前不知道休寧話“著tcio°”的來源是入聲的藥韻字，還是早期促化過的魚韻字。因此只能說，從語法觀點來看，休寧話承繼江東方言的方位介詞“著”，又添上“著”字完成貌詞尾的用法。但從音韻觀點去看，卻不能判斷“著 tcio°”字是否屬於魚虞有別的音韻層次。

第三，一旦發現“著”字之所以會在蘇州話，上海話說成[tʂiʔ]音是因為它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立刻就出現了個問題：為什麼這個字魚(開)韻的說法，保存在魚虞有別的層次？

吳語里的魚(開)韻字，各地差不多都是這十幾個字：

豬，煮，鼠，芋，箸，鋸，去，渠_他，魚，虛_{-腫}，
許_那，那兒，絮，蛆，徐姓，梳，鋤

還有一些上沒有討論的字：

薯，褚姓，汝(蘇州nEʔ “僚”)

從這些字可以歸納出一條原則：如果是南朝口語中的常用字，倒不一定會保存在魚虞有別的層次。例如“箸”在溫州(dzei)，溫嶺(dzi)是魚(開)韻字，在蘇州(zu)是魚(合)韻字。蘇州，上海只說“筷子”，不說“箸”，所以魚開韻的*zi在口語失傳。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南朝口語中的常用字，就一定不會保存在魚虞有別的層次里。

現在的問題是：“著”字的哪一種用法在南朝是口語中的常用字。

“顯著”的“著”，“著作”的“著”在南朝出現頻率不高，在現代吳語里也不是魚(開)韻字。當時口語中唯一常用的是方位介詞“著”字。據此，“著(仔)tsi³”字之所以保存在魚虞有別的層次，是因為它在南朝用作方位介詞。

下一步推論是說“吃仔飯”的“仔”，從音韻，詞匯的觀點來看，是承繼南朝“著”字方位介詞的用法。這就從另一個角度來支持我們“現代吳語完成貌詞尾‘仔tsi³’來自方位介詞‘著’字”的假設。

現在做個小結。

最簡單的想法，是假設句法層和音韻層之間的對應是一對一的關係。本文提出個反例。吳語的前身，從南朝開始一直有個魚虞有別的層次。這個層次最初是主流，北方音系侵入以後，就淪為底層。另一方面，吳語的前身在兩宋時代受了北方的影響，於是產生[動+完成貌詞尾+賓]的結構。

蘇州話，上海話的[tsi]，最初在南朝用作方位介詞，後來蛻變為完成貌詞尾。“吃仔飯”這句吳語常用的話，可以說是南朝音韻，兩宋句法。本文用音韻，語法兩種標準給“吃仔飯”斷代。兩種標準所訂的年代相差五百年有餘，正好說明這段時期之間“著”字已經從方位介詞變成完成貌詞尾。

附錄一：魚(開)韵“苧”字

“苧”在蘇州(zɿ)，上海(zɿ)，溫州(dzei)，溫嶺(dzi)都是魚(開)韵字，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1960)討論蘇州話時說：

少數特例：乳苧zɿ²(虞魚)，廁tshɿ(之)；嘴^ctsu，吹^ctshy，
水^csu(支旨)

這裡只有“苧”是魚韵字。後來知道知系聲母魚韵字蘇州話說[i]韵的還有“鼠sɿ”，“煮tsɿ”，問題還存在：為什麼“苧”是特例？

最近在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1992，臺灣學生書局)216-217頁找到答案。下面轉錄劉書，附注寫小字，移入引文中。

至遲在春秋時代，浙東已有麻，葛紡織業，東漢時，其產品極為精美，成為貢品，也是北方上層社會歡迎寶貴的物品。六朝麻，葛織業就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三國時代，浙東的麻布，葛布是具有地方特色優良的紡織品，
魏文帝曾說：“江東為葛，寧可比羅紈綺縠也。”

<<太平御覽>>總頁3627<魏文帝詔>又說：“代郡黃布為細，樂浪練為精，太末(末)布為白。”同前書，總頁3649，引<<魏略>>太末屬會稽郡。寧紹平原是浙東紡織最發達的地區，山陰的葛布，諸暨，剡縣的麻布<<嘉泰會稽志>>(宋元地方志叢書之十，臺北，大化書局)總頁6487，“苧之精者，本出苧羅山”。苧羅山在諸暨縣，又：“強口布以麻為之，出於剡機。知殊粗，而商人販婦往往競取，以與吳人為市。強口去剡十五里，其溪水尤紺澈可愛。”都是其中的精品。而整個浙東都產麻布，新安郡也是苧麻產地。<<梁書>>卷53<良吏傳>，
伏曰桓為新安太守，“郡多苧麻，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唐開元中，婺州，衢州(以上二地在金衢盆地，相當於六

朝的東陽郡地)，處州，溫州(以上相當於六朝的東陽郡地)，處州，溫州(以上相當於六朝的永嘉郡地)，皆貢紵布。

上引這段說明，江東地區至晚從六朝開始已經出產麻布，而且品質優良。苧麻，紵布是江東的土產。“苧麻”，“紵布”是江東方言中土生土長的語詞。於是“苧”成為魚(開)韻字，現在蘇州話說[zɿ²]。

“苧”字澄母魚韻上聲，“著”字知母魚韻去聲。蘇州話“苧 zɿ²”，“著 tɕi²”的演變平行。

附錄二：麗水話中的魚虞之別

上面論證青田話有魚虞有別的層次，資料用傳國通等<<浙江吳分區>>(1985)。傳書收字不多，現在用麗水話補證。

麗水，青田都在浙南，屬於麗衢片。從西到東是麗水，青田，溫州。溫州魚虞有別的層次非常清楚，如果麗水也有個層次魚虞有別，就可以間接證明青田話也有這樣的層次。

謝雲飛 <麗水西鄉方言的音位>，<<中華學苑>> 第38期(1989)，1-68描寫的麗水話分成白讀，文讀兩層。

白讀層

鼠 tshɿ, 箸 dzi, 梳 si, 絮 si

豬 ti, 煮 i

蛛株 ty

鋸 kw, 去 khw, 渠他 gw

居 ku

文讀層

tɕy 諸豬文蛛文株文朱珠居煮文主柱舉著註注蛀

tɕhy 蛆區驅取娶處趣去文

dzy 除廚儲渠住巨拒距具

cy 舒輸書殊虛^鬚須需暑署豎許序緒絮
 zy 徐樹聚叙

很清楚的，麗水話白讀層魚虞有別。

附注

本文為慶祝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Yuan Ren Chao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成立而作。研究期間，受張琨(1985)，李榮(1980)兩位先生的文章啟發，後來又和楊秀芳先生切磋討論。本文的題目是讀楊秀芳(1992)後想起的。在此一并致謝。拙著(1979)發表後，1979年6月收到趙元任先生的明信片，今影印附在文後，聊表飲水思源之忱。

參考書目

- 丁邦新 198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 <<史語所集刊>>59.1.13-22。
 _____ 1992: <漢語方言史和漢語方言區域史的研究>,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 1.23-29。
 太田辰夫 1987: (蔣紹愚, 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
 平田昌司 1993: <休寧方言的“體”>, <<中國東南方言語法討論會>>(1993, 復旦大學), 1-12。
 李榮 1980: <吳語本字舉例>, <<方言>>1980.137-140。
 呂叔湘 1985: <<近代漢語指代詞>>。
 袁家驊 1960: <<漢語方言概要>>。
 張琨 1985: <論吳語方言>, <<史語所集刊>>56.2.215-260。
 梅祖麟 1979: “The etymology of the aspect marker *tsɿ* in the Wu dialec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1-14.

- _____ 1988: <漢語方言里虛詞“著”字三種用法的來源>,
 <<中國語言學報>> 3.193-126。
- _____ 1991: <唐代·宋代共同語的語法和現代方言的語法>,
 <<第二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 35-36。
- _____ 1993: <南北朝的江東方言和現代方言>, 國際中國語言
 學學會第二屆年會, 巴黎, 1993年6月。
- 曹廣順 1983: <祖堂集中的“底(地)”, “卻(了)”, “著”>,
 <<中國語文>>1986.3.192-202。
- 許寶華, 湯珍珠等 1988: <<上海市區方言志>>。
- 傅國通等 1985: <<浙江吳語分區>>。
- 詹秀慧 1973: <<世說新語語法探究>>。
- 葉祥苓 1988: <<蘇州方言志>>。
- 楊秀芳 1992: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著”及持續貌>,
 <<漢學研究>>10.1.349-394。
- 潘悟雲 1983: <中古漢語方言中的魚和虞>, <<語文論叢>>第
 二輯(上海教育出版社), 78-85。
- 劉淑芬 1992: <<六朝的城市和社會>>。
- 謝雲飛 1989: <麗水西鄉方言的音位>, <<中華學苑>> 38(1989
 年4月).1-68。
- Edkins, Joseph, 1869: A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ersbyterian Mission Press.

謝煥祖林:

I enjoy very much reading your
 fine article on the tsz in the Wu dialect.
 Just a fine point: in Shanghai the
 initials in 吃 and 吃 are both [z] rather than
 [ts]. But ~~Shaochow~~ and many others of the
 Wu have [ts] in 吃 and 吃, Shaochow being
 supposed to be Wu par excellence.

Regards!

元任

THE DATING PROBLEM OF tɕhiI? tsɿ vɛ
IN THE WU DIALECT

Tsu-lin Mei

Cornell University

tɕhiI? tsɿ vɛ is a common expression in Shanghai and Suzhou meaning “have eaten (the meal)”; tɕhiI? is a verb meaning “to eat”, vɛ is its object meaning “a meal”, and tsɿ is the marker for the perfective aspect. When we try to date this expression, that is, to find out the date of its earliest antecedent, we get two different results. The structure “V+perfective marker+O” first arose in the 11th century. But the etymology of tsɿ is 著, and in Shanghai and Suzhou, 著 becomes tsɿ only in the phonological stratum inherited from the Jiangdong dialect of the 5th and 6th centu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the 500 year difference given by two dating criteria, grammatical and phonological.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erfective marker 著 tsɿ was previously a locative marker, attested in 5th and 6th century texts and preserved in Min dialects. There are also transitional dialects such as Qingtian 青田 in southern Zhejiang and Xiuning 休寧 in southeastern Anhui in which the forms cognate to tsɿ are used both as the perfective marker and the locative marker. The reason why tɕhiI? tsɿ vɛ gives two dates is because tsɿ (or more precisely, its etymon) changed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 while retaining its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